



# 法学生“啄木鸟”成长记

实习生 李佳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雪儿

地铁同站进出乘被扣费、被迫触发App“摇一摇”开屏广告、购买电影票拒退改签、下载软件后捆绑安装其他软件、迪士尼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有一群法学生紧紧抓住这些生活中“不对劲”的时刻，耗费一两年走上市庭。

推着他们成为原告的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以下简称“小城杯”）。比赛从2012年发起，是由上海市司法局、华东政法大学（以下简称“华政”）、上海市律师协会、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开展的长期性法律公益活动，鼓励在校法学生以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公众利益。

“‘小城杯’是挂在我面前的一颗糖，你总会想去够一下。”一名参与“小城杯”的学生说。

## 成为实践中的“啄木鸟”

2024年年底，王洁莹再次回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她偶然发现，自己还是穿着和2019年进入迪士尼那天相似颜色的衣服。迪士尼一如既往人多，哪怕当天天气寒冷，下了十几分钟冰雹。

5年前，王洁莹还是华政的一名大三学生。她携带零食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时，被工作人员翻包检查并告知园内禁止携带食物，王洁莹认为这是“霸王条款”，她还发现，这项规定仅针对迪士尼亚洲园区。后来，她将迪士尼诉至法院。几个月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对相关格式条款内容进行修改。这一度是“小城杯”最广为人知的故事。2020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将“啄木鸟奖”授予王洁莹。

十多年下来，这样的学生“啄木鸟”越来越多。

“小城杯”成立之初就是希望搭建象牙塔里的法学生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2012年，小城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吴辰思考学校和律所之间的联动，也想招毕业生，他曾向媒体表示，当时他们恰好人才青黄不接。

时任华政国际法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寿新宝彼时和毕业生交流了解到，学生在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正好寿新宝带的一名学生在小城律所实习，寿新宝与吴辰达成共识，“我们能看到的实务训练都还停留在模拟法庭，有没有可能再与法律实务关联一点”。

2012年，公益诉讼制度首次被写入法律。吴辰希望，学生们能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用法律工具解决问题，“真刀真枪地在实务层面经历一场诉讼”。

华政学生、第十届“小城杯”参赛者周懋认为，这个比赛给了他们一个较好的机会，在那些“感觉不对”的地方停下来想想，规则是不是本应如此。

2023年底，林湛发现有人抱怨某社交软件的新规定——充值SVIP会员后便可查看访客记录及删除对他人的访问记录。林湛感觉这项规定似乎存在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她把自己的困惑和周懋、杨勇聊起，恰逢第十届“小城杯”开赛，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以此为诉讼主题参赛。

由于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法领域并不熟悉，他们找到华政特聘研究员、智能法学专业的王镭咨询。

在华政图书馆的咖啡厅里，王镭第一次见到了他们。他们打印出来的材料厚厚一沓，纸面上布满圈圈画画的痕迹。“打动我的是这个案件本身。”王镭说，这类互联网公司面对的各类诉讼中，不乏包裹着公益性诉讼外衣的“滥诉”，“在这个领域里面，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2021年，我国



王洁莹和队友们第一次开庭前的合照。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王镭和参赛学生在讨论。



李明芮参与的一个案子，她在两年里从法院收到了一大堆材料。



王洁莹在给孩子们做线上讲座。

个人信息保护法才正式颁布，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很多新兴问题仍属于当前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长期处于法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王镭承认在实践方面力有不逮，正因如此，“小城杯”的学生们给他带来了惊喜，“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日新月异”。

有的法官起初对于学生团队提起诉讼有些异议。林湛告诉记者，法官曾询问过她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案子，他平常接触的都是一些有实际损失的纠纷，对这类只索赔一元的诉讼表示不解。她们表示，这类“一元诉讼”往往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直接受损提起诉讼，更多的是因某规则违背了法律规范和侵害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

而法官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法律不是纯粹的黑与白、正与负，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舆论等。”寿新宝认为，法律是更立体、综合的。

大部分“小城杯”参赛者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两年过去，曾诉某互联网医疗平台违规首诊的参赛者蒋振豪用“信念的冒险”形容这场诉讼。立案的过程困难重重，案件管辖权难以确定，他们在几家法院中周折，几次被拒。最终立案并达成诉讼前调解，该互联网医疗平台退还了当事人误诊所耗费用。

“这场诉讼很复杂，有很多医学与法律的交叉，有很多现实的困难。”蒋振豪说，他们就得保卫某些东西，不应该因为一件事情复杂而放弃它，“重要的是人不能克服内心的高山”。

参赛过程中，王镭邀请学生走出学校参与数据法前沿问题的研究论坛，让学生去了解互联网公司制定平台守则和隐私政策的思考角度，从而更好地找到有力的诉讼思路。

## 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慢慢松动着

在学校的模拟法庭上，这些学生

过各种席位，而“小城杯”让他们真正成为原告。

参赛学生施范皓彦表示，“小城杯”在他心里留下的关键词是“沟通”。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去打官司，才发现走上法庭之前，还涉及大量和法官、被告之间的交流，太多细节是书本上、课堂上接触不到的。

有的法官起初对于学生团队提起诉讼有些异议。林湛告诉记者，法官曾询问过她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案子，他平常接触的都是一些有实际损失的纠纷，对这类只索赔一元的诉讼表示不解。她们表示，这类“一元诉讼”往往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直接受损提起诉讼，更多的是因某规则违背了法律规范和侵害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

而法官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法律不是纯粹的黑与白、正与负，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舆论等。”寿新宝认为，法律是更立体、综合的。

大部分“小城杯”参赛者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两年过去，曾诉某互联网医疗平台违规首诊的参赛者蒋振豪用“信念的冒险”形容这场诉讼。立案的过程困难重重，案件管辖权难以确定，他们在几家法院中周折，几次被拒。最终立案并达成诉讼前调解，该互联网医疗平台退还了当事人误诊所耗费用。

“这场诉讼很复杂，有很多医学与法律的交叉，有很多现实的困难。”蒋振豪说，他们就得保卫某些东西，不应该因为一件事情复杂而放弃它，“重要的是人不能克服内心的高山”。

参赛过程中，王镭邀请学生走出学校参与数据法前沿问题的研究论坛，让学生去了解互联网公司制定平台守则和隐私政策的思考角度，从而更好地找到有力的诉讼思路。

## 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慢慢松动着

在学校的模拟法庭上，这些学生

过各种席位，而“小城杯”让他们真正成为原告。

参赛学生施范皓彦表示，“小城杯”在他心里留下的关键词是“沟通”。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去打官司，才发现走上法庭之前，还涉及大量和法官、被告之间的交流，太多细节是书本上、课堂上接触不到的。

有的法官起初对于学生团队提起诉讼有些异议。林湛告诉记者，法官曾询问过她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案子，他平常接触的都是一些有实际损失的纠纷，对这类只索赔一元的诉讼表示不解。她们表示，这类“一元诉讼”往往不是出于个人利益直接受损提起诉讼，更多的是因某规则违背了法律规范和侵害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

而法官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法律不是纯粹的黑与白、正与负，它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舆论等。”寿新宝认为，法律是更立体、综合的。

大部分“小城杯”参赛者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两年过去，曾诉某互联网医疗平台违规首诊的参赛者蒋振豪用“信念的冒险”形容这场诉讼。立案的过程困难重重，案件管辖权难以确定，他们在几家法院中周折，几次被拒。最终立案并达成诉讼前调解，该互联网医疗平台退还了当事人误诊所耗费用。

“这场诉讼很复杂，有很多医学与法律的交叉，有很多现实的困难。”蒋振豪说，他们就得保卫某些东西，不应该因为一件事情复杂而放弃它，“重要的是人不能克服内心的高山”。

参赛过程中，王镭邀请学生走出学校参与数据法前沿问题的研究论坛，让学生去了解互联网公司制定平台守则和隐私政策的思考角度，从而更好地找到有力的诉讼思路。

## 一些“不合理”的规则慢慢松动着

在学校的模拟法庭上，这些学生

量大概只有90后小时候的一小半。

更何况，教学容量不减反增，教学难度更是今非昔比。听一名20多年教龄的语文教师说，以前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上的部分“日积月累”，现在挪到了二年级。孩子班主任老师悄悄告诉我，全班同学基本都提前学过，只有两三个孩子真正零起点入学。

我不禁有些同情孩子，每天上学都像徒步攀爬陡峭的山崖，放学写作业则像小学应用题里“蜗牛爬井壁”的那只可怜的蜗牛，爬三米、掉两米。

虽说教育部明文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但我问了几个城市的朋友，老师都在以各种隐晦的方式布置作业。

一个教育大省的朋友说，作业全部发在QQ群里，孩子在纸上写完后拍照上传，老师批改后再传回群里。老师、家长、孩子仿佛游击队队员，想尽办法躲着上面的明文规定——毕竟，如果一二年级不写作业，到了三年级难度更是直线上升。

就拿学拼音来说，老师恨不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讲新课，拼音每天学一节课，不到两个星期就要会拼读。孩子面对这套全新的陌生的语言体系，无所适从，过了两三天顺利读下来“ā、á、ǎ、à”四声。

教学进度显然也不是老师能改变的——一周5节语文、4节数学，这个课时

学，但是万万没想到，小学一年级辅导起来竟然这么难。翻开配套练习册（老师偷偷让家长买的），我终于明白为啥大江南北的家长都要“陪作业”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只能靠家长念，念完还得详细解释题目要求。

小学毕业20多年，没想到小学已经考察到了“毫米级精度”。“不行”的“不”读几声？“不要”的“不”读几声？“一个”的“一”是几声？“一年”的“一”是几声？“一二三”的“一”又是几声？我直到上了初中才意识到这些文字现象，感觉颇为好玩，没想到现在变成实打实的练习题了。

“写出地名里的数字：三亚、五常、六盘水、九江。”

“‘木’字减两笔变成什么字？”

面对这些花样百出的习题，小孩更加无所适从——他连地基都没打好，现在直接让他“顶峰相见”。

我努力扮演好“引导思考”的角色，尽量和颜悦色地问孩子：“你看‘三亚’

这个地名里的数字是什么呀？”“‘木’字减两笔，你要怎么减呀？”

孩子有些不知所措。看他那呆滞的目光，估计连题目要求都没听明白。

如果“怒火”能够具象化，我头顶的火焰烈度估计丝毫不输燎掉孙悟空猴毛的火焰山。

微信群、QQ群更添了一把火。哪些同学的当日作业得了优秀、哪些同学考了100分，老师都不忘拍照发群里。神经大条的儿子，鲜少跻身其中。每当因为辅导作业心烦，再收到老师发来的群消息，烦恼加倍。

因为孩子不喜欢写作业、听不懂题目，我一度怀疑过他的智商。

可是，上小学之前，他分明看起来那么正常，甚至还有点机灵。一上小学，顿时变得一无是处——分不清p和q、b和d，笔顺不对，算术总出错。当然，更别提那些高难度的练习题了。

为了辅导作业，我尝试过不少方法：学着书上说的，让他自己安排写作业的节奏，即便迟迟不写也不催他；让他独自写

作业，我不在一旁督工。总而言之，激发小孩的自主性。

无奈这些方法一一落败。作业的难度像一座大山，留他一人面对，他更加不知所措，只好神游万里。

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围吐槽辅导作业之难，无意中聚拢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大家互诉衷肠，那一刻，我们只是一群被孩子作业折磨、又因为对孩子抑制不住怒火而倍感煎熬的妈妈。

有家长说：“晚上做梦都在辅导孩子功课，梦里都是鸡飞狗跳，全身紧张，醒来拳头都是握紧的。”

这个描述令我心疼不已，但我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

一年级下学期才开学一个月，小孩就带回家一张勉强及格的试卷，他还笑嘻嘻地缠着我问周末去哪玩。我努力笑着接过这张满是红叉的纸，安慰自己说，教育是长跑，眼前的得失不重要。

晚上，他又磨磨蹭蹭不肯写作业，我的怒火噌地冒出来了。为什么都是我来承受这些？丈夫为什么从来不过问孩子的学

习？他偶尔可以早点下班，但也很少主动凑过去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

为了辅导好作业，我看了好几本教育专家的书，但他们似乎都没有亲自辅导过自家孩子，只会讲宏大而遥远的教育学理论：“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温和而坚定”“不建议‘抢跑’，会消耗孩子的学习兴趣”。

只有一本书的内容深得我心：“古语云‘子不教，父之过’，既不是‘母之过’，也不是‘父母之过’……但现在普遍出现职责错位的情况。”

我把书里这段话在微信上转发给丈夫，收到的只有沉默。看来，他也知道辅导作业不是啥好差事。

有家长安慰我说：“吃点逍遥丸和阿胶吧，补补气血。”

一个周末，我又来到中医堂就诊。

刚把完脉，中医大夫的手机忽然响了。隔着厚实光滑的大木桌，我听到手机里传出小男孩的声音：“爸爸，我的作业本在哪儿啊？”

中医大夫那常年舒展松弛、带着微笑的脸忽然皱巴起来，声音也不像平时那样细声慢语：“你去卧室找找，在客厅里找什么？”这股不耐烦的劲儿，让我倍感亲切。

挂断电话，他恢复了平时的和善，继续看舌苔。我笑着伸出舌头：又找到了一个被孩子作业折磨的家长。

# 我该怎样“陪作业”

□ 李二丫

中医大夫把完脉，沉吟了一会儿。“伸出舌头我看一看。”他说。

我尽量优雅地伸出舌头，管理好面部表情不要大狰狞。

“好了。”他不紧不慢地说，“肝火太旺了，少吼孩子。”

一语戳到痛处。小孩他爸工作太忙了，只能由我来管小孩的学习。虽说早就上网打过预防针，身边也有高年级家长给我发出过“前方高能预警”，但我还是没想到，辅导一年级的小孩竟然这么难。

小学开学前，班主任发了一张调查表，了解孩子的性格、特长以及是否提前学过小学内容。当时我暗自庆幸，以为“抢跑现象”终于得到治理。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没提前学”的副作用在一年级开学后迅速显现出来。

就拿学拼音来说，老师恨不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讲新课，拼音每天学一节课，不到两个星期就要会拼读。孩子面对这套全新的陌生的语言体系，无所适从，过了两三天顺利读下来“ā、á、ǎ、à”四声。

教学进度显然也不是老师能改变的——一周5节语文、4节数学，这个课时

量大概只有90后小时候的一小半。

更何况，教学容量不减反增，教学难度更是今非昔比。听一名20多年教龄的语文教师说，以前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上的部分“日积月累”，现在挪到了二年级。孩子班主任老师悄悄告诉我，全班同学基本都提前学过，只有两三个孩子真正零起点入学。

我不禁有些同情孩子，每天上学都像徒步攀爬陡峭的山崖，放学写作业则像小学应用题里“蜗牛爬井壁”的那只可怜的蜗牛，爬三米、掉两米。

虽说教育部明文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但我问了几个城市的朋友们，老师都在以各种隐晦的方式布置作业。

一个教育大省的朋友说，作业全部发在QQ群里，孩子在纸上写完后拍照上传，老师批改后再传回群里。老师、家长、孩子仿佛游击队队员，想尽办法躲着上面的明文规定——毕竟，如果一二年级不写作业，到了三年级难度更是直线上升。

就拿学拼音来说，老师恨不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讲新课，拼音每天学一节课，不到两个星期就要会拼读。孩子面对这套全新的陌生的语言体系，无所适从，过了两三天顺利读下来“ā、á、ǎ、à”四声。

教学进度显然也不是老师能改变的——一周5节语文、4节数学，这个课时

量大概只有90后小时候的一